

海派经济学

程恩富 顾海良 主编

崔世春 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若干思考

——海派经济学家冯金华访谈

〔日〕伊藤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可行性与中国道路

刘桂斌 发挥现有优势 创新比较优势 实现跨越式发展

胡学勤 论建设我国全面小康社会中的经济发展理论

孙永正 拍卖住宅建设用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制度障碍

赵平之 中外私人资本剥削问题思考

邓 屏 从中国现阶段的MBO看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绩效

张丰兰 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一种选择

——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和自治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冯瑞召 朝鲜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概况

俞咪咪 朝鲜的对外贸易

〔加拿大〕米切尔·A·莱伯威茨 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人与财产

吴立波 郦 菁 论虚拟经济的本质、作用与历史地位

〔埃及〕米萨尔·阿明 直面帝国

〔美〕斯蒂格利茨 挑战华盛顿共识

——斯蒂格利茨访谈

奚兆永 申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答胡世祯、郭冠清并论『生产关系与交换』的翻译

张忠任 关于白暴力的平分余量转型方法的模型分析

刘社建 刘方斌的经济思想与学术贡献

丁 冰 『四代四杰』的经济研究与创新

——读《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五辑）》

周肇光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批评西方新保守主义

——海派经济论坛第二次研讨会综述

F0-55
C730:7
:5

F0-55
C730

海派经济学

程恩富 主编
顾海良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派经济学. 第5辑/程恩富,顾海良主编.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4

ISBN -81098-114-5/F·107

I. 海… II. ①程… ②顾… III. 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理论-文集
IV. F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9382 号

- ☐ 特约编辑 徐永禄
- ☐ 责任编辑 麻俊生
- ☐ 封面设计 周卫民

HAIPAI JINGJIXUE

海派经济学

程恩富 顾海良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装订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3.25 印张 258 千字

印数 0 001—1 800 定价:22.00 元

目 录

专 访

- 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若干思考
——海派经济学家冯金华访谈 崔世春(1)

论 文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可行性与中国道路 [日]伊藤诚(11)
发挥现有优势 创新比较优势 实现跨越式发展 刘桂斌(26)
论建设我国全面小康社会中的经济发展理论 胡学勤(36)
拍卖住宅建设用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制度障碍 孙永正(48)
中外私人资本剥削问题思考 赵平之(56)
从中国现阶段的 MBO 看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绩效 邓 屏(67)
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一种选择
——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和自治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张丰兰(73)
朝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概况 冯瑞召(83)
朝鲜的对外贸易 俞咪咪(96)
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人与财产 [加拿大]米切尔·A. 莱伯威茨(107)
论虚拟经济的本质、作用与历史地位 吴立波 邴 菁(120)
直面帝国 [埃及]萨米尔·阿明(143)
挑战华盛顿共识
——斯蒂格利茨访谈 [美]斯蒂格利茨(150)

争 鸣

- 申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答胡世祯、郭冠清并论“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翻译 ... 奚兆永(156)
关于白暴力的平分余量转形方法的模型分析 张忠任(173)

人 物

- 刘方棫的经济思想与学术贡献 刘社建(181)

书 评

- “四代四杰”的经济研究与创新
——读《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五辑)》 丁 冰(194)

综 述

-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批评西方新保守主义
——海派经济论坛第 17 次研讨会综述 周肇光(198)

CONTENTS

Interview

On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An Interview with Economist Feng Jinhua Cui Shi-chun(1)

Paper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oad Makoto Itoh(11)

Exert present advantages, creat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chieve transcendent development ... Liu Gui-bin(26)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ll Round Way" in China Hu Xue-qin(36)

Selling Residential Land by Auction is Institutional Obstacle to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he Well-off Society
..... Sun Yong-zheng(48)

On the issue of private capital exploitation Zhao Ping-zhi(56)

From MBO Nowadays to See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Private Ownership Deng Ping(67)

A Choice of Public Ownership Realization

——A introspection of Yugoslavia social ownership and its autonomy Zhang Feng-lan(73)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Korea Since 1990's Feng Rui-zhao(83)

North Korea's Foreign Trade Yu Mi-mi(96)

Man and Proper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sm Michael A. Lebowitz(107)

The Nature, Role and Historic Position of Virtual Economy Wu Li-bo Li Jing(120)

Confronting the Empire Samir Amin(143)

Challenge Washington Consensus Stiglitz(150)

Debate

On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ics

——to Reply to Hu Shi-zhen and Guo "Guang-qing and Comment on the Transl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Xi Zhao-yong(156)

A Mathematical Analyses on Transformation Model of Bai bao-li by "Deuces Surplus Margins" Method

..... Zhang Zhong-ren(173)

Peop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cademic Ideas of Pro. Liu Fang-yu Liu She-jian(181)

Book Review

Econom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by Four Elites of Four Generations

——Reading Talk with China's Famous Economists (Vol. 5) Ding Bing(194)

Overview

To Perfect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Criticize the Western Neo-conservatism

——An Overview of the 17th Seminar of the Economic Forum of Shanghai School ... Zhou Zhao-guang(198)

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若干思考

——海派经济学家冯金华访谈

崔世春

内容提要 对任何一门科学来说,方法都十分重要。经济科学更是如此。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应当以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为主,同时分析、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各种行之有效的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以此来研究和解决现实经济中那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特别是研究和解决那些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 经济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当代西方经济学

崔:冯教授,您毕业于武汉大学,曾获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和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后来又 to 英国和美国学习了很长时间,并长期在武汉大学经济学院讲授发展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有比较多的了解。

冯:现在,我在上海市委党校继续研究西方经济学,是有一些了解。

崔:我读过您写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有专著《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您参加编写的国家教育部“核心”教材《西方经济学》,也是我过去经常读的。

冯:其实,我大学的专业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我出生于 1957 年,还算比较年轻,但与某些年轻学者轻视马克思经济学不同,一直到现在,我对此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崔:听说您最近在研究经济学方法论,并撰写《海派经济学宣言·方法论篇大纲》。很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看法。

冯:非常乐意和您一起讨论。

方法:经济分析的“显微镜”和“化学试剂”

崔:对任何一门科学来说,方法都十分重要。恐怕不会有人怀疑这一点。

收稿日期:2003-12-31

作者简介:崔世春(1967—),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博士。

冯:是的。但对经济学来说,方法尤其重要。这是因为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研究可以借助于显微镜和化学试剂,经济学却没有这样的“方便”。对经济学家来说,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他们所特有的“显微镜”和“化学试剂”。只有借助于科学方法,经济分析才可以深入到经济现象的本质之中,揭示其发展的客观规律。

当然,经济学研究也有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地方。例如,尽管经济学家不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但却可以而且应当“在社会历史过程发展得最为充分的地方来考察社会历史过程”。比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时就选择了当时这种生产方式最典型的地方——英国。

此外,经济学家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进行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实际上,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就曾在这方面做过大量的工作,试图在人为创造的实验环境中来探求经济行为的因果关系和检验经济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还由于在实验经济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总的来讲,由于经济系统的极端复杂性和人类行为的高度易变性,到目前为止,经济实验还远不如自然科学中那样成功——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像后者一样成功的程度。因此,对经济学家来说,大脑还是主要的“实验室”。他们的“实验”主要还是在自己的大脑中进行,即是所谓的“思想实验”。

由此可见,由于经济研究的特殊性,经济分析要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自己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都毫无例外地重视对经济学方法的研究和运用。

崔:比如马克思?

冯:马克思一贯强调方法的意义是众所周知的。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他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就一清二楚了。在这两版的序言和跋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自己使用的方法,特别是由他本人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没有这些方法,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也证明了这些方法的成功和价值。

崔:现代的西方经济学家呢?

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也非常重视对方法的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可以说是相当之多的。总体来讲,西方经济学家大都遵循着一些他们认为是“不证自明”的或“约定俗成”的“规范”。比如,研究的出发点是所谓的“经济人”——这还是来自两百多年以前亚当·斯密的传统。经济人则被假定为具有两个根本性的“特点”,第一是“自利”,第二是“理性”。“自利”讲的是经济人行为的“目的”;“理性”则是说,经济人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对他自己

来说总是“最优”的。自利的目的和对最优行动的选择合在一起,意味着经济人的行为总是“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满足需要的“手段”即资源常常是有限的。因此,选择又是在一定的约束之下进行的。于是,归根到底,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自利而又理性的经济人如何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进行合理的选择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些不证自明或约定俗成的规范,其实就是他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所形成的一些共同方法。

“马”首是瞻和“兼收并蓄”

崔:前面谈到了经济学研究中的两类重要的方法,即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您觉得,不同的方法有优劣之分吗?

冯:就方法本身而言,用得上一句老话:“条条道路通罗马”。对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经验和偏好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方法。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方法之间确实存在着优劣甚至对错的差别。

崔:那么,您觉得哪一种方法更加好呢?

冯:这当然要看研究的是什么问题。方法的优劣和对错并不是绝对的,常常与研究的问题有关。有的方法在研究某个问题时“得心应手”,但在研究另一个问题时却可能“寸步难行”。

不过,总的来讲,我还是更加“钟情”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这里讲的马克思方法,不仅仅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包括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如“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等等。正是借助于这些方法,马克思创作出了博大精深的《资本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资本论》都堪称人类智慧之果中的“极品”,体现了人类智力的极高成就。至少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家中还没有哪一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尽管他们对许多经济现象的分析也不乏“深刻”的见解。

崔:您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的方法?

冯:如果从亚当·斯密算起,西方经济学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两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们不断地从经济理论中提炼、不断地从其他科学中借鉴,使自己的方法日趋成熟、日臻圆润。其中,有许多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这些有用的部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忽视的。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与其理论一样,也是鱼龙混杂、良莠并存。比如,在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中,过度抽象、过分形式化、过于追求技巧、缺乏历史感、缺少现实性等缺陷也是司空见惯的。因此,在对待西方经济学方法的态度上,我们首先还是要区分有用的和无用的、科学的和不科学的或不够科学的。

崔: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在方法方面有哪些工作要做呢?

冯:我以为,概括起来讲是八个字:继承、吸收、发展、运用。

首先是“继承”。这主要是讲继承马克思的方法。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学要有自己的新方法,那我想,这个新方法应当以马克思的方法作为基础和主干。我相信,马克思的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有助于揭示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而且也将有助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我们应当坚持用马克思的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解释经济行为、设计经济政策、评论经济思潮。

在继承方面,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具体方法进行“梳理”。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专门论述这些具体方法的著作。除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里有比较集中(但仍属高度概括)的论述外,马克思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论述散见于很多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他的经济学鸿篇巨著《资本论》(包括被称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经济学手稿》之中。因此,对马克思的具体方法,需要去发掘、整理和提炼。应该说,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许多所谓的“研究”仅仅只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的一些说法。比起所投入的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果是少之又少。

其次是“吸收”。这是指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借鉴其他经济学(如现代西方经济学)甚至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如哲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中行之有效的科学成分,并应用马克思的方法对它们进行整理、分析和改造。换句话说,我们不当简单地排斥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比如,不当简单地排斥现代西方经济学。我们的原则应当是科学地“兼收并蓄”。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他们总是时刻密切关注着现实经济的变化,并不断地以此来检验和改进自己的理论;他们对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并随时准备在自己的理论中吸收这些文明的成果。

当然,我们说“兼收并蓄”,并不是把马克思经济学方法和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简单地汇总起来,而是要有机结合或综合,即程恩富教授所说的“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具体来说就是:首先找出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中的科学成分,然后确定这些科学成分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中的适当位置,最后把两者结合起来。这里,“成分”和“位置”都是十分重要的。成分不对或者位置不对,都无法很好地完成综合的任务。

讲到兼收并蓄,我倒想提一下“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态度。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各种原因,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方法一直存在着“偏见”。开始时是存心“敌视”,后来又是盲目“轻视”。这种“歧视”直到今天仍然非常严重。说老实话,

如果他们能够认真地学一学马克思的方法,恐怕对他们会大有好处——尽管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结论与西方经济学有天壤之别,但撇开这一点不论,仅就某些具体的方法而言,马克思有很多可供他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当然,反过来说,这一点对我们也是适用的——我们也应当尽可能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崔:第三是“发展”。

冯:对。只是简单地继承马克思方法和借鉴其他方法是远远不够的。除了继承和借鉴之外,更重要的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方法也是如此。“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的“未来”之所在。现实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来寻求答案;同时,随着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科学)进步为标志的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也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方法有了可能。

最后是“运用”。我们现在研究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责任重大,意义重大,难度也很大。应当承认,无论是与蓬勃发展、一日千里的中国实际经济相比,还是与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理论相比,我们的研究都还显得比较滞后和稚嫩。这不仅表现在理论本身的创新和系统化不够上,也表现在所使用的方法的陈旧和老化上。尽快地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并以此带动理论上的突破,从而更好地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是我们讨论方法的根本目的所在。

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要以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为主干,同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中的科学成分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以此来研究和解决现实经济中那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特别是研究和解决那些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的重大问题。

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崔:我想大家对发展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必要性不会有什么异议。问题是如何发展。在这方面,您有什么考虑?

冯:我这里提一个还不是很成熟的《海派经济学宣言·方法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我把整个的方法论体系分为四个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即研究对象、研究结果、研究过程、叙述方法。四个部分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法论体系。

崔:请具体谈谈。比如研究的对象……

冯:研究对象来源于客观事物。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事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它,从不同的方面去把握它。不过,就方法论而言,比较科学

同时也是比较方便的做法是把它看成所谓的“现实具体”。在这里,“现实”是指事物的“客观性”;“具体”则指事物的“多样性”——即任何事物都包含有极其丰富的按照一定的规律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规定,是“多样性的统一”。其中,每一个规定都对应着客观事物在某一方面的特征。全部规定的总和,构成了客观事物的整体,即“现实具体”。因此,所谓现实具体,就是由客观事物的各种规定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总体或整体。从这样一个整体出发,能够比较好地总结经济学研究方法中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性质。

崔:研究结果又有什么特点?

冯:科学研究的任务是要在观念中把握研究对象即现实具体。在观念中再现的现实具体就是所谓的“思维具体”。之所以称之为思维具体,是因为它同样包含了丰富的规定,也是“多样性的统一”。思维具体的这些规定是我们根据研究的任务而有意保留下来的——它们在解释现实具体的本质和规律方面被认为具有更加充分的说服力。当然,与现实具体相比,思维具体的规定性要“稀疏”一点,因为现实具体中那些我们不感兴趣的所谓“细节”已经被撇开。科学的任务就是要用思维具体来反映现实具体的内部结构、解释现实具体的行为规律、预测现实具体的发展趋势。实际上,与现实具体相比,思维具体的规定性并不是简单的稀疏“一点”,而是要稀疏“很多”。两者是不同数量级的差别。

崔:研究对象是现实具体。研究结果是思维具体。接下来是……

冯:接下来是如何从现实具体出发,获得既符合逻辑又符合实际的思维具体。这就是所谓的“研究过程”。我们知道,思维具体是多样性的统一;但是,构成思维具体的那些规定却是来自现实具体。因此,为了构造出思维具体,必须先从现实具体那里取得“建筑材料”。换句话说,从现实具体到思维具体的道路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从具体到抽象”,即从现实的具体出发,经过“分析”,抽象出它的各种规定;第二步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在第一个过程中所得到的现实具体的各种抽象的规定出发,经过“综合”,构造出思维的具体。在“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两个过程中,具体的含义是不相同的。前一个具体是现实的具体,后一个具体则是思维的具体。

更具体一点说,在第二步中,我们首先是找到最抽象的规定(概念或范畴),通过分析其内在的矛盾,发展到下一个比较具体的规定;然后重复这个过程,一直上升到作为反映现实具体的思维具体。由此可见,全部的研究过程可以分解为两个子过程,即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过程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过程。前者把现实具体“分解”为组成它的一些重要规定,后者把这些规定再按某种合理的方式“粘接”起来,合成再现现实具体的思维具体。无论从时间上看还是从因果关系上看,都是先有一个分析的过程,然后再有一个综合的过程。作为研究结果的思维具体就是这两个过程共同作用的产物。

崔:最后是叙述方法?

冯:对。研究过程的结果是思维具体。但是,如果思维具体一直停留在观念之中,那就无法进行“交流”,也不可能长期“存在”——它会随着思维主体的衰老、死亡等而消失。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就需要“整理”并“发表”作为研究结果的思维具体,使其具有易于交流的某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如发表的论文、著作)。这就涉及到所谓的“叙述”方法。

叙述的方法与研究的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所谓叙述,叙述的就是研究的过程和研究的结果。离开了研究,叙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但是,正如思维具体不是现实具体的完全“复制”一样,叙述也不是研究的简单“复述”。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往往要在“黑暗”中长时间地反复探索,只是在经过了大量的尝试之后,才有可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其中,会走一些“弯路”,有时还会“迷路”,甚至还可能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这些中的绝大部分都会在叙述的过程中被看成无关紧要的东西而略去。就好像拍电影一样,研究是其中的前期拍摄,而叙述则是后期的剪辑和制作。有时,在被“剪”掉的东西中有一些可能会在科学传记之类的作品中作为“花絮”出现,但通常较少见诸“正规”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

从现实具体(研究的对象)到思维具体(研究的结果),再到思维具体的外化(论文和著作):这就是全部研究过程的一个完整周期。

崔:听起来很像马克思的方法。

冯:那当然。实际上,在这个方法论体系中,基础确实是马克思的,不过,并不局限于马克思。在这个体系中,我们对马克思的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对马克思本人没有涉及,或虽有涉及但却未能充分展开的一些重要方面做了深入的讨论,对过去有些人以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而出现的一些错误做了必要的澄清,对现代经济学(主要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有关理论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崔:您说的“马克思……未能充分展开的一些重要方面”是指什么?能否举几个例子?

冯:比如,马克思在讲从具体到抽象时,就没有详细地讨论抽象的“限度”问题。他只是简单地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最抽象的范畴是商品及其价值关系——后者是前者的“细胞”。我们现在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对任意一个研究对象或现实具体(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抽象的范畴或细胞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细胞为什么是商品及其价值关系?或者,换个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细胞形式的经济范畴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性质?弄清楚这一点之后,接下来就可以“推而广之”,回答下面的问题:对于“一般”的研究对象或现实具体,作为细胞形式的经济范畴又应当具

备什么样的性质?这样,我们就把问题提到了方法论的高度。如果这个问题也得到解决,则再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讨论其他一些“特殊”的研究对象或现实具体(比如社会主义社会等)的细胞形式。

又如,马克思在讲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时,也没有涉及到上升过程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只是以一种“简化”的方式描述了上升的过程,其中,主要是本质序列的上升(如从产业资本到商业资本再到生息资本)和历史序列的上升(如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我们现在要进一步研究的是,除了本质和历史的上升序列之外,还存在哪些形式的上升?不同形式的上升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比较不同上升形式的相对优劣,或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上升形式?等等。

崔:还有,您说的“对……一些错误做了必要的澄清”,也可以举例说明吗?

冯:比如,过去经常出现的一种错误是:一方面把研究方法看成只包括从具体到抽象而不包括从抽象到具体;另一方面把叙述方法又看成只包括从抽象到具体而不包括从具体到抽象。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双重”的错误。实际上,研究方法中既有从具体到抽象,也有从抽象到具体,叙述方法同样也包括了这两个方面。换句话说,从抽象到具体不仅仅只是叙述的方法,而且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更是)研究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也不仅仅只是研究的方法,同时还是叙述的方法。当然,区别也是有的。例如,一般来说,与“研究”相比,在“叙述”中,从抽象到具体的份量要更“重”一些,是叙述的主干和基础,起着塑造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的作用,而从具体到抽象则要“轻”得多,主要是在构成理论体系的各个局部环节上起补充和烘托的作用。

又如,过去有些人不适当地强调“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甚至把它抬高到了“原则”的高度。这也是不对的。其实,马克思本人(包括恩格斯)并不很在意这种统一。他们更加强调的是逻辑而不是历史,强调可以超越历史的形式、历史的偶然性等,尽管他们也乐意指出,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他们的逻辑有时恰好和历史保持了一致。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它可能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牺牲逻辑的严密性。我们前面说过,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有两个主要的序列,即本质的序列和历史的序列。这两个序列有时很难“一致”,拿“商品—货币—资本”来说,尽管这一序列和历史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但却明显不同于本质的序列。首先,在货币的诸多规定中,商品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比如,纸币早就完全脱离了商品;其次,在资本的诸多规定中,货币就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另外一些规定如劳动力成为商品。由此可见,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尽管是反映历史发展的序列,但却不是本质的发展序列。这样的逻辑安排也许是因为资本最初的载体是货币,而货币的最初载体

是商品。类似地,“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生息资本”是本质的序列,但却不是历史的序列。

崔: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新的方法论体系也可以用来说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吗?

冯: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比如,在我们的方法论体系中,研究的结果是思维具体,思维具体又会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和客观事物本身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它不断地把自己的触角伸向现实具体的更加广阔的外部空间和更加细微的内部结构。在这种发展中,思维具体本身也会变得越来越精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接近现实。

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早期阶段,它的全部经济学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整体,各部分的界限朦朦胧胧、昏昏暗暗。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算是混沌初开,划出了宏观和微观两大部分,并延续至今。宏观和微观的区分告诉我们,经济并不是一个笼而统之的囫圇物。它的不同范围和不同部分往往受到一些不同规律的支配。因此,研究和分析的方法也要随之而调整。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常常提到的“节俭悖论”和“合成谬误”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很好例子。

然而,微观和宏观的两分法并非尽善尽美。继续深入讨论下去就会发现,还有许多经济现象是两分法所不足以概括的。这里特别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在传统的宏观方面,通常只将其界定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形成的国际经济,一般只被看成是传统宏观及微观经济学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运用。这种处理方法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有很大的很多的不同。例如,至少就目前来看,资源在国际间流动所受到的阻碍比在国内流动要多得多,也大得多。在许多国家,人口流动受到移民政策的严格控制。尽管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商品和资本的流动越来越迅速、越来越自由,但仍然还存在着诸多的障碍,如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等等。因此,与其把国际经济看成是传统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跨国界运用,不如把它看成是与微观与宏观有所不同的“宇观”。

第二,在传统的微观方面,实际上包括了相当多的很不相同的部分。例如,有纯粹的单个个体(如作为个人的消费者),有由这些个体结合形成的组织(如家庭和企业),有由这些组织结合形成的部门(如行业),有由这些部门以及消费者共同形成的市场(如商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等),有将上述等综合在一起但范围上又比整个国民经济更小一些的区域经济(如城市、地区,等)。稍加分析即可知道,上述所有这些部分各自都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只用一个“微观”的术语来概括,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有必要根据上述这些不同的情况,把传统的微观进一步分解。例如,把纯粹的单个个体,叫做“渺

观”,把由单个个体形成的组织叫做“微观”,把行业(部门)、市场以及区域等叫做“中观”。

“中观”的概念很早就有人提出。不过,过去的“中观”主要是指行业或部门。实际上,除了行业 and 部门之外,“中观”还应当再包括两个方面,就是“市场”和“区域”。包括市场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因为,市场是一个比行业或部门更加“广泛”或更“大”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了行业或部门(行业或部门是市场的“供给”方面),而且 also 包括了消费者(如个人和家庭)即需求方面。如果行业 and 部门属于“中观”,则市场毫无疑问也应当属于“中观”。

至于把“区域”也纳入“中观”的范围,则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的考虑与上面把市场看成中观的理由大同小异:区域要比行业或部门更加具有综合性。第二个方面的考虑则是相对于宏观来看的:宏观涉及的是整个国民经济,而在一国之内,某个区域的经济不属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把区域经济纳入“中观”的范围来加以研究。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我们国家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存在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因此,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尽管也存在着所谓的“区域”经济,但是,由于它们的区域经济是与其他区域的经济以及整个的国民经济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必要把某个区域单独地划出来专门加以研究(城市经济学是一个例外)。我们现在的情况则不一样:区域之间的差别很大,相互封锁也比较严重。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特点分别进行研究。

On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An Interview with Economist Feng Jinhua

Cui Shi-chun

Abstract Methodology is very important for any science, particularly for economics. Chinese economic researchers should build their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on basis of Marxian economics, and use modern western economics for reference at the same time,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of China.

Key words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Marxian economics modern western economics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可行性与中国道路

[日] 伊藤诚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成就,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潮的驳斥,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消除西方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多方面影响。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发展 新自由主义批评

一、中国经济在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历史作用

1973 年以来,随着微电子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和日益更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行为日益深化。与此相适应,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强调竞争性市场经济的理性效率、削弱政府的经济职能、实行国企私有化、削弱工会组织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日益占据统治地位。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1988 年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一系列变革仍在继续进行。事实上,美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已经被看做全球化的标准。新古典主流经济理论则成为这股浪潮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

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实现像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所期望的经济效率和和谐分配。以日本为例,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后,日本一直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的经济没有得到任何发展。在这 10 年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日本失业率连续攀升。许多亚洲国家同样也受到了 1997~1998 年由于经济泡沫破裂所导致的货币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美国一度繁荣的新经济在 2000 年秋天,随着股市泡沫破灭而告终,并随后进入衰退期。2001 年的“9·11”事件更是雪上加霜,深陷贫困与饥饿的外围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在目前的世界经济环境中找到一条希望之路。

收稿日期:2003-11-7

作者简介:伊藤诚,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荣誉教授,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相比之下,中国从1978年改革以来,坚持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政策和逐步引入市场经济,成功地实现了大约10%的年增长率,保持了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虽然中国存在着下面将要讨论的一些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但与苏联和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出现的悲剧性的混乱和经济生活的崩溃相比,中国在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成功,成就仍然是十分显著的。前苏联和不少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迅速和全面过渡到资本主义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系统变革,这被称为“休克疗法”,并且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反复不断的、不稳定的萧条局面。

上述事实是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潮的有力驳斥。但是,在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往往容易被解释为完全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结果,而与社会主义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占主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不相适应的,中国正自然而然地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轨道运行。^①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自身增长必然会形成一种适合人类活动的最自然的经济秩序。同时,如果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不会系统运行。这种观点由于受到狭隘的意识形态框架的限制,从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做最终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经济秩序。

然而,正像马克思明确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本不是一种自然秩序,而是自16世纪以来在西欧开始形成的一种历史的特定社会秩序。它重复造成并加深了剥削、异化、经济生活的动荡、劳动人民的贫穷、生态恶化、金融投机以及由于投机破灭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和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贫困,表现出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内在问题,而不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然运动法则的一种偶然违背。

社会主义力图克服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社会主义过去被等同于苏联模式,或者说被认为是构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全面计划经济模式,它力图系统地解决无政府状态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那时被当作苏联模式的一种替代模式而提出,认为应当把市场经济灵活的调节职能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比其他任何一个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都更复杂、更灵活,它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似乎追求一种更实际的战略。由于中国的改革完全根据理论行事,因此,中国的改革被普遍认为是通过实际上的社会主义自我毁灭而走向资本主义的步骤,中国官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也经常受到怀疑和批评。这些怀疑和批评不仅针对中国政府的问题,同时也针对世界上那些努力寻求

^① 例如,Nakagane认为,世界上许多人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他看来,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协调,公有制条件下,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在中国正走向消亡。